

中央苏区时期的节庆活动

□ 孙 伟

晨5时半，由校长兼政委报告开会意义后，即宣布比赛开始。具体项目如下。

军事类。首先，刺枪。各营演习时所有学员鼓足精神，如临真敌，动作敏捷、整齐，刀光耀目，杀声震野，演毕跑步归列。其次，基本教练。各营抽出一连，演习基本队形变换。最后，战斗动作。主要科目为“营内第一梯队连对防御敌人的进攻”，为便于群众检阅，选择在平地进行。队伍自“进攻出发地”开始“冲锋”，占领了“敌”防御地带。演习时附近数万群众陆续赶到，站在会场一侧观看。经评判，第一营获得第一。

政治类。有五个项目，第一项是讲演竞赛。各营及校直属队各选一人登台演讲，评选结果是直属队刘熙元表现最好，他讲的内容为“九四”国际青年节的特殊意义和当前的任务与工作。第二至第五项分别为：墙报——第二营第四连第一，政治问答竞赛——第七连第一，青年团测验竞赛——第五连第一，募捐购买“少共国际号”飞机的竞赛——第八连第一。这四项只在大会上宣布成绩。

体育类。首先是球赛。计划两场篮球赛、一场足球赛，因时间关系只举行了篮球赛。“中央”队对红校甲队，前15分钟，8∶6，“中央”队赢，后15分钟，2∶2平分，最终“中央”队获胜。其次是田赛。跳远——第一营选手第一，5.45米；跳高——第二营选手、县政治保卫分局选手第一，1.41米；杠杆——第一连选手第一，90分。最后是径赛，因时间关系未能举行。

中午1时，已汇聚当地群众及少先队、劳动童子团、赤卫队等两三万人。这时，前线送来了1000多名志愿加入红军的白军俘虏，全场一致鼓掌，欢呼“红军胜利万岁”“欢迎白军士兵当红军战士”。他们也登台演讲痛陈军阀罪状，同时积极报名参加红军。此时大会更加热闹，到3时全体通过了致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电文才结束。

在特定的纪念日举行运动会，开展军事体育项目的革命竞赛，通过热火朝天的大比拼，既巩固了平日的训练成果，又锻炼了身体，活泼了精神，提升了军事素养。

举办晚会

1933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作出《关于“八一”纪念运动的决议》。指出“八月一日是全世界反帝国主义战争纪念日，同时也是中国南昌暴动纪念日，中国工农红军即由南昌暴动开始，逐渐在斗争中生长起来”。因此，隆重纪念“八一”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工农剧社为纪念“八一”节，定于7月30日举行盛大晚会，并在《红色中华》报7月29日第97期刊发消息。《红色中华》8月4日第99期跟踪报道了晚会盛况。对观众的热情用了“人山人海”一词：“七月三十晚，工农剧社举行纪念‘八一’的晚会。事先相当的准备了两个剧本，两个活报，和唱歌跳舞等，并且特别邀请毛主席讲演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因为预料观众必然很多，工农剧社就发了入场券，藉以维持会场秩序。果真到了那天下午五时，便从各机关来了许多同志，有票的进了大门便在人山人海中间挤进去，没有票的那就只有望洋兴叹了。有的甚至从花窗洞裡把用后的入场券偷运出去，可见观众的踊跃了”。观众饶有兴致地聆听了毛泽东讲述红军的历史，并观看了演出。

为了庆祝1933年的十月革命节，工农红军学校政治部准备“在十一月七日以后以营为单位与当地群众共同举行晚会，表演关于纪念节的活报剧本等，七日晚上全校与地方群众共同举行盛大群众大会”，还要与地方开了一次妇女青年的晚会，以示庆祝。

晚会的节目一般有歌舞、双簧、相声、杂技、说书、武术、京剧、口琴等，自编自演的《庐山雪》《八一》《亡国恨》等戏深受好评。《八一》由聂荣臻创作、罗瑞卿导演，罗荣桓、何长工、钱壮飞等都登台演出过。演出高潮时，欢笑声、鼓掌声、欢呼声经久不息，异常热闹。

除了上面提到的几种形式之外，还有游艺活动、提灯大会、检阅部队、化装讲演等。中央苏区时期的节庆活动，做到了语言通俗简明，形式多样灵活，起到了教育鼓动的良好效果。这些喜闻乐见的欢庆活动与节目，受到了广大军民的拥护与欢迎，极大调动了革命与生产的积极性，鼓舞了士气，启发了阶级觉悟，活跃了业余生活。大家期盼良久，参与度高，情绪高昂，朝气蓬勃，在条件艰苦、物资匮乏的苏区时期，真可谓精神大餐、欢愉盛宴。

举行运动会

1932年9月4日，工农红军学校于“九四”国际青年节17周年纪念日之际，为了粉碎国民党第四次“围剿”，打倒帝国主义，用革命竞赛的方法，鼓舞阶级斗争的积极性，提高政治水平及加强军事战斗力，检阅学习成效，特在瑞金附近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运动会。早

“幸福渠”：延安时期的红色水利工程

□ 薛永毅

延安枣园革命旧址是中共中央书记处1943年10月至1947年3月的所在地。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此期间，继续领导了全党的整风运动 and 解放区军民的大生产运动。革命旧址内，有一条叫“幸福渠”（裴庄渠）的水渠横穿枣园流过。水渠尽管不长，却是大生产运动和延安精神的历史见证。

靠天吃饭是靠不住的。陕甘宁边区地处西北，雨少风多，常遭荒旱，所谓“三年一小旱，十年一大旱”。加之边区地广人稀，农业生产大部仍沿用相当原始的简陋技术和工具，所以这里每年群众收获的丰歉，几乎完全决定于雨量的多少，这说明在这个地方靠天吃饭是靠不住的。

但是，试图通过兴办水利以达到增加农业收获的目的，在陕甘宁边区也绝非易事。首先从历史上看，陕北这个地方曾有过三次兴修水利，但这三次无一例外都失败了。而在当地群众看来，修水利既费劳动力又花钱多，倒不如去开荒。因此，就在延安市裴庄渠修建之初，当地老百姓对这个水利工程能否产生效用，同样是表示怀疑的。有的说：“修水地太难了，不成功白花费银钱。”还有的说：“整理一亩水地，倒不如开三四亩荒地打的麦子多哩！”有些老百姓甚至抱着这样的态度，宁愿把地丢下，也不愿分摊修理费。

针对这些情况，深入地宣传发

动和解释工作成为先决条件。边区政府用了很多宣传手段，给群众解释为什么要兴修水利以及水利工程带来的好处等，同时向他们宣传科学技术知识。这其中，用具体鲜活的事例来教育群众，无疑是获得群众真正信任和拥护的不二选择。而裴庄渠的修建，就承担着这样一个示范水利工程的使命。修建它的意义，就是要打破一般群众对修水利的错误见解，给边区的群众看，告诉他们修水利并不是难事。而只有兴修水利才是预防旱灾的重要途径，才有可能增加农业收入，实现丰衣足食。

兴修水利应该“大家动手”。延安市裴庄渠是在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下，广泛动员附近群众共同建成的。为修筑这条水渠，陕甘宁边区建设厅在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仍拨款4000元，并指派毕业于北洋工学院（天津大学前身）的边区水利专家丁仲文负责勘测设计，指导当地群众修建。由于当时科技人员缺乏，参与设计修建的除了丁仲文外，其他都是没有土木工程科学知识的工农干部。于是，丁仲文就手把手地教，最终使大家学会了使用仪器、设计坝址等科学知识。而在财力及现代建筑材料缺乏的情况下，丁仲文就和大家共同想办法。他们克服困难，就地取材，采用碎石坝挡水，用木板作闸板。在这种艰苦困难的客观条件下，延安市裴庄渠从1939年8月动工，到11月大

地封冻前已完成了主要工程。次年3月解冻后继续施工，4月底建成竣工并开闸放水。

陕甘宁边区政府除了直接拨款外，还发动附近群众按照每亩地2元进行入股，成立了裴庄渠水利合作社，并由参加水利合作社的群众民主推选出担任主任、会计、宣传、组织、工程等工作的5个委员，负责水渠的护理和灌溉等事宜。

为了提高裴庄渠的利用率，用“看得见”的丰收果实教育群众，自1942年起，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还派了技术工作人员，组成裴庄水利管理所，亲自经营着枣园30亩农场。由于经营管理得好，仅用了7个月就获利45700元。

“新式水利工程”的第一次试验。兴修水利是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中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科学技术手段对边区农业环境进行保护和改造的探索实践，这在边区不啻为一种伟大革新。因而，延安市裴庄渠修建伊始，就被《新中华报》誉为“新式水利工程”，称“这在边区还是第一次试验”。

当然，陕甘宁边区水利事业的探索实践，也并非一路顺利。事实上，就在裴庄渠建成竣工后不到2个月，也就是1940年6月末，延安市附近各县就遭遇山洪冲击。“山洪爆发，水头高约2丈，冲动了数万斤大石，2尺直径的大树，被拔起滚流下来，冲击力更大。”汹涌的山

洪，直接造成竣工不久的裴庄渠大坝被冲毁。

这次裴庄渠因山洪受灾虽大，但在边区政府建设厅和当地群众的积极努力下，按照“支费小而收效大”的原则于同年10月再度动工。这次水渠重修，吸取了前次的经验教训，注意把新法修筑的内容与当地的具体条件和民间的历史经验很好结合起来，对水渠进水口等进行修改。在军民的共同努力下，新的裴庄渠于1941年4月19日告成。

“幸福渠”水流不尽。建成后的延安市裴庄渠，自裴庄起，经过了庙嘴、磨家湾、枣园、侯家沟，直达杨家崖，全长约6公里，灌溉面积达1500亩。作为陕甘宁边区延属分区灌溉面积最大的水渠，据1943年春天统计，能放水的有1072.5亩，每亩以增收细粮三斗计，年可增收细粮321.75石（1石约为50公斤），解决了延安市机关的蔬菜问题。应该说，裴庄渠的建成使用，让枣园、裴庄一带的群众变“靠天吃饭”为旱涝保收，极大地惠及了当地群众，裴庄渠由此也被称为“幸福渠”。

也正是在“幸福渠”的示范带动下，边区各地大小水利工程如雨后春笋，普遍发展起来。据统计，1943年全边区的水地共13647.6亩，增收的细粮可供约一万人一年食用。总的来说，兴修水利极大地增加了粮食产量，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的生产目标。

“新旅”：一群爱国奋进的小好汉

□ 石平洋

一群十几岁的小学生，在抗日烽火中，走出校门宣传抗日历时17年，共赴国难旅行修学行程5万余里，克服重重困难，为民族解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称赞，被誉为“中国少年儿童运动史上的一面旗帜”“民族解放的小号手”。这就是著名的“新安旅行团”（以下简称新旅）。在2021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的少先队员回信，高度赞扬新旅不怕艰苦，以文艺为武器，唤起民众抗日救亡，宣传党的主张，展现了爱国奋进的精神风貌。

在游学行程中增长才干。淮安市新安小学是陶行知先生于1929年创办的，1930年陶行知委派陈庄师范学生汪达之到新安小学任教，并接任第二任校长。汪达之上任后，和老师们认真实践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教育思想，制定了详细的“生活方法”，让学生读活书，活读书，学做事，学做人。1933年10月22日，汪达之将新安小学7名学生（最大的17岁，最小的12岁）组成“新安儿童旅行团”，到镇江、上海等地进行了为期54天的修学旅行，在当时上海滩和舆论界引起了轰动。有了这一次的成功，汪达之决定再组织一个更大规模的旅行团到全国去宣传抗日救亡。

在党的领导下宣传抗日。新旅团员运用多种多样的文艺形式，开展抗日救亡宣传。他们通过放映抗战电影、排演街头歌舞蹈、教唱救亡歌曲、写标语、绘壁画、编辑出版刊物，进行抗日宣传。抗战初期演出传播了红军时代流传的《儿童舞》《海军舞》《抗日平舞》和革命秧歌。1940年，排演了《春的消息》《爱在人间》等舞蹈和舞剧《虎爷》。解放战争时期，新安旅行团在解放军中表演推广腰鼓舞等，受到战士们的热烈欢迎。

深入抗战前线 and 少数民族地区慰问宣传。新旅团员和其他团体组成“上海妇女儿童绥远前线慰问团”，到绥远百灵庙前线慰问。慰问

团冒着零下20℃的严寒代表上海人民向抗日将士致敬，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等剧，演唱了抗日歌曲。全团深入绥远西部汉、蒙、回各族杂居之地，至蒙古包、王府、喇嘛庙等处放映电影、教唱救亡歌曲，打破了各民族之间的隔阂，唤起少数民族特别是牧民们的抗日救亡意识。1938年2月，新旅到达兰州，经八路军兰州办事处批准，新旅3名团员入党，并建立了党支部。从此，新旅就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从事抗日宣传工作。

在抗日烽火中茁壮成长。组建儿童团，扩大抗日队伍。新安旅行团到达苏北根据地以后，受到刘少奇、陈毅等领导同志的接见并接受了“组织10万儿童”的任务。新旅团员们以忘我的精神投身到抗日斗争中来，他们派出工作队分赴阜宁、盐城、淮安、建阳、涟东、盐东、射阳等县组织儿童团、少先队，不到两年时间即组织起盐阜区18万儿童参加抗日斗争，超额完成了刘少奇、陈毅交给他们的任务。广大儿童团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宣传活动，组织各种宣传队、秧歌队、腰鼓队等，配合人民子弟兵和地方民兵站岗放哨，盘查行人，送信带路。

在反“扫荡”中经受战火洗礼。1943年春，面对日军“扫荡”，新旅近90人，分成4个队，换上便衣，手中只有七八支汉阳

造的步枪和20多颗手榴弹，和敌人周旋，常常一天吃不上一口饭，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得到了锻炼。1945年9月，攻克淮阴淮安战役即将打响，新旅团员到火线前沿去做宣传鼓动工作。他们爬上屋顶我军的机枪阵地，送给战士宣传品和食物。攻城开始后，新旅团员也和战士一起登云梯爬上城墙，冲到城内街上，为冲锋杀敌的战士鼓劲助威，向垂死挣扎的敌人喊话劝降。

在解放战争中完成使命。抗战胜利后，新安旅行团给毛泽东写信，汇报工作和学习情况，表达在党的领导下坚持革命斗争的决心和信心。1946年5月20日，毛泽东亲笔给新旅复信：“新安旅行团各位同志：来信收到，极为感谢！祝你们努力工作，继续前进，争取民主中国的胜利。”1946年秋天，国民党军进攻淮安，新旅又一次被迫北上，随华东野战军转战苏、鲁、冀、豫，成为一支深受部队欢迎的文艺宣传队。沂蒙山麓，济南城下，淮海战场，长江岸边都留下他们战斗的足迹，并多次在敌人眼皮底下脱离险境。他们把标语贴进了济南城，把秧歌舞扭到了南京，把胜利的腰鼓敲进了大上海。1952年，根据中共上海市委的决定，新旅在上海和其他几个文艺团体合并，组建上海歌剧院。

部可供提拔，陈云认为有，“问题是我们没有去提拔，去培养”；三是中青年干部缺乏经验，陈云认为“才干是锻炼出来的，并不是天生的”，而且中青年干部有朝气，多数有专业知识，“他们比我们当年被提升为干部时有更多的长处”。他还就相关工作部署提出比较系统的建议。这篇文章不到3000字，但讲问题、提对策、释疑惑、作部署，把提拔中青年干部的紧迫性、可行性分析得十分透彻。

1984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入城市，进行全面改革，并明确社会主义经济还是商品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陈云作了重要发言，就是《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书面发言》，全篇只有约1700字，但把他关于改革的思想表达得十分清楚到位。他认为正在进行的体制改革要打破“大锅饭”，大大调动劳动积极性，解放生产力；肯定对计划体制改革的概括符合目前的实际情况，“现在，我国的经济规模比五十年代大得多，也复杂得多。五十年代适用的一些做法，很多现在已不再适用”；认为改革涉及范围相当广，广大干部还不很熟悉，在进行中还会出现一些现在难以预见的问题，“必须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经验”。这些重要的文章，篇幅都很精练，语言都非常朴实自然，道理都讲得那么透彻，效果都那么显著。陈云写文章，注重的是实质内容，而不是形式。文风也是党风。陈云的好文风，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四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

（上接1版）

要言不烦，文风朴实

陈云工作作风务实，反映在他写文章时，也是条理清晰，简洁明快，不发长篇大论的空洞议论。《陈云文集》收入的《报纸要为广大读者着想》中，他对《人民日报》进行阅评，表扬一些文章简明扼要，建议长文章要简单明了，吸引更多的读者来看。他要求“报纸要为广大读者着想”，“报社的领导和编辑要经常提醒自己：‘假如我是读者’”，‘假如我是一个很忙的读者’”。

《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是陈云于1978年11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小组发言。这篇讲话，全文不到1500字，开宗明义表示支持工作重点转移到

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提出“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这篇讲话文字不多，但讲的都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问题，句句切中要害，论证有力，在会上都引起很大反响。

陈云于1981年5月8日写的《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极大促进了干部新老交替与合作。陈云首先讲问题所在，大批老干部还在党政军第一线工作，因积劳成疾而去世的人越来越多，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我国近十亿人口大国的繁重领导工作，要“从现在起，就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陈云回应了老干部的一些疑虑：一是“文革”中有提拔造反派的痛苦教训，陈云表示“我们要提拔的是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二是党内有没有大量这样的中青年干